

# 黄河文化的长度、宽度和高度

王中江

## ■ 阅读提示

■ 他们创立的思想文化的丰富多样和复杂深刻，令人惊讶，为中国文明和文化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不断再生的活力。

■ 从思想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上说，黄河文化的历史长河既孕育了东周百家子学，后在不同时期又依次产生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

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再如，公共性的政治伦理和理性，从传说的五帝时期特别是尧舜下延到殷周的转变再到周公，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哲学方面如天道、阴阳、五行和气等自然哲学观念也产生了。经典《尚书》《国语》

和《左传》都留下了他们的思想记忆。《书》是长时间演变的产物，它的部分篇目一定很早就出现了；《易》即便不像所说的“人更三世，世历三古”，但它的最初来源一定也很早，这些古老文本都承载着许多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的信息。按照“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书·多士》），按照甲骨文的材料，殷商时期中国的文字系统已经成熟，但它不可能只是殷商的产物，应有很早的源头。

二是黄河文化具有高度的创造性，这是说它的高度和深度。其主要表现是哲学和思想的突破，是一般所说的在世界上并起的“轴心时代”的文明。这是黄河文明的一次高峰。经过三代的长期演变、积累，在春秋战国的大转变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大的变革；一个自由流动的“士”阶层诞生了；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又是哲学和思想的创造者。用《七略》的话说，子学的创造“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见《汉书·艺文志》）。他们有一部分是执政官（如法

家、名家等的不少人物），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职业生涯，又是新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者；那些在政治上机会不多或没有机会的儒家人物如孔子、孟子和荀子，墨家人物如墨子，还有游离于政治之外的道家人物，如杨朱、列子和庄子等，都成为百家子学的创建者和重要的发展者。他们创立的思想文化的丰富多样和复杂深刻，令人惊讶，为中国文明和文化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不断再生的活力。

三是黄河文化整体上具有包容性和竞争性，这是说它的宽度和丰富性。从地域分布说，黄河文化在不同地域中分别建立了河湟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各具特色的文化；从思想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上说，黄河文化的历史长河既孕育了东周百家子学，后在不同时期又依次产生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从黄河文化贯穿的主要观念来说，天道观、人道观、认知和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社会政治和人格理想、人文精神等，整体上都属于它的一部分。

从秦汉开始的文明和文化为什么以黄河流域展开，除了它的地理条件外，同它处于政治中心有很大关系。从秦到北宋，国家的都城主要是在黄河中游的咸阳、西安和黄河下游的洛阳、开封。虽然经历了魏晋的分裂和南渡的东晋和南北朝，但黄河流域仍然有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性。这使得黄河文明和文化前后既具有很强的坚韧性、连续性，又有不断的再生性。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探讨当代敦煌美术发展

本报记者 张丽

“老一辈艺术家对于敦煌的理解与表达，更偏向于一种展现敦煌第一面貌的保护性研究，通过大量临摹作品，传播、弘扬敦煌艺术精神。例如张大千的敦煌艺术作品就是复原了原始壁画的艺术形态，常书鸿的临摹更具有保护性。靳尚谊先生，包括我本人，则将艺术表现的重心放在了敦煌第二面貌研究之上，即吸收其千年来风沙侵蚀而造成的剥落感、肌理感，结合当代艺术观念的融入与追求，逐渐形成由传统临摹演变到现代艺术语言探索的独特风貌。”在不久前举办的“敦煌与20世纪中国美术——以‘靳尚谊、唐勇力绘画展’为例学术研讨会”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原院长、教授唐勇力探讨当代敦煌美术发展与不同时代的人对敦煌艺术构成的审美语言

和创作理念时说道。

他认为当下有关敦煌话题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敦煌学、敦煌美术史、敦煌艺术创作实践三个方面，其中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与文献图像，使之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最博大的历史宝库；美术史学者更偏重从美术专业角度进行解读与分析；画家面对敦煌壁画艺术则更侧重于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能否具有一种当代视角，将时代感与艺术创作体会联系在一起。“不同专业领域对于敦煌都有着不同的感悟与理解。”在唐勇力看来，“以今天的视角、更深层次的问题思考方式，来研究敦煌艺术或壁画，从而可以传递出一种理念，‘敦煌’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符号，具有更加广博的宽度与更加精深的厚度。”

## “做平常人，演不平常戏”

本报记者 杨雪

在不久前的中国戏曲电影展上，“尚长荣戏曲电影艺术台前幕后的故事”活动在绍兴举办。当晚，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名誉主席、中国影协戏曲电影专委会会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与百余戏迷见面，畅聊艺术人生，以及参加戏曲电影的体会。他说，演戏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做平常人，演不平常戏”是自己的座右铭。谈到戏曲电影拍摄，他认为，电影是当下“弘扬我们古典而优美的民族戏曲艺术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活动中，戏曲电影导演滕俊杰介绍了他与尚长荣合作的经历。“尚先生在拍摄过程中总是全身心投入，唱念做打舞，处处极致以求，他对艺术尽善尽美、精益求精的态度让人感动。”滕俊杰回忆，有一次拍摄一场重头戏，尚先生

突然一脚踩空，摔倒在地。现场所有人吓得不敢动，但尚先生一个前滚翻，坐在地上了定神说：“滕导我没事，从小练过童子功，咱们继续拍摄。”提及尚长荣在美国好莱坞受到最高规格礼遇时，滕俊杰表示，尚先生以自己的高超艺术为中华戏曲艺术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了无上荣光。

不负时代，无愧梨园，这是尚长荣始终的艺术执念与情怀。警世之作《曹操与杨修》、明世之作《贞观盛事》、劝世之作《廉吏于成龙》是尚长荣的代表作，他在不同题材、不同人物、不同主题思想的作品中，积极践行“激活传统、融入时代”的艺术探索，是中国戏曲界一代楷模——戏曲评论家毛时安在见面会上对尚长荣的戏曲艺术作了全面介绍，并对其亲力亲为参与戏曲电影拍摄与探索作了专业、精细的评析。

## 探究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运用的新路径

本报记者 谢颖

民间文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民间文艺版权研究，将对推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激活民间文艺版权价值、促进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发挥积极作用。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2022年度版权研究课题组近日举行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运用研讨会”上，多位专家从理论与实践不同角度出发，共同探究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运用的新路径。

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德伟表示，民间文艺的固有特征使该领域的版权保护工作特殊而复杂，需从概念层面厘清保护对象的内容、范围、特征，以奠定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基础；同时在立法层面，平衡“源”的保护与“流”的创新发展是重中之重。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万建中论述了民间文艺认定的三个维度：一是生

活范式的表演状态，相关活动嵌入当地生活语境，完全出自生活节律和身体释放的需要；二是空间维度，民间文艺由一个特定群体在其原生表演场域上共同实现；三是时间维度，表演范式不断重复，这一与生俱来的机制保障了民间文艺的传承性。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宝林在总结发言中说，鉴于民间文艺的特殊性，相关的版权法规也应更具包容性。同时，注重区分民间文艺的精神权和财产权，注重区分原始状态、族群代代相传、一定公有领域下的民间文艺，与经过整理、传承人二次加工的民间色彩文艺作品，守好民间文艺源头，层次分明地开展版权保护工作。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以历史的观点分析问题，扎实推进工作，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领域为全球展示中国范本。

## 影像中的经典之声、时代乐音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影视歌曲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优秀的影视歌曲因其明显的时代印记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第44期影视大讲堂以“技术变革时代电影的声音、影像与造型”为主题在线上举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金燕从影视主题曲的角度发表了学术观点。

金燕回顾总结了中国电影主题曲的发展历程，她认为，“十七年电影”（1949-1966）中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主题曲，比如《敖包相会》《山歌好比春江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这些经典歌曲多使用民族民间音乐的元素，旋律优美，朗朗上口，描绘各民族生活场景的同时表现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美好向往。这一阶段的电影不仅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更有大量的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作品，其主题曲充满了对先烈的崇高礼赞，如《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红梅赞》等。改革

开放以后，许多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歌曲不断涌现，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爱你中国》《大海啊故乡》《牡丹之歌》这样充满真诚热爱的咏叹，曲调轻快明朗，生机盎然，与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氛相呼应。

她表示，新时代影视歌曲风格更加多样化，已经涌现出令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绒花》《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重用让老歌焕发出新的生命，《平凡之路》《只要平凡》等原创歌曲则代表了这个时代百老汇的心声……这些时代之声，也许会成为下一个流传的经典。



# 元张养浩的《三事忠告》

王杰

《三事忠告》是元代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所著的《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和《庙堂忠告》的总称，是中国古代官箴书的代表。“牧民”在此指的是治理人民；“风宪”意为法律风纪；“庙堂”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场所，用于代指朝廷。《三事忠告》也就是对地方官员、监察官员和中央官员由衷的劝告。

张养浩是元朝著名的散曲家，代表作有《山坡羊·潼关怀古》。他一生中历经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八朝更替。因为这些皇帝在位的时间较短，所采用的政策和治理方式也各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断断续续和混乱，使得国家的统治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张养浩一心一意为国为民，不管是在地方上，还是在朝堂上，他都是一身正气、严以律己、处事果断，被称为一代好官。民国时期，蔡东藩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丛书《元史通俗演义》一书中，曾两次提及张养浩，并称赞其忠于职守、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

张养浩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把自己的官场经历记录在一本书中，希望能够告诫当下时代和未来的官员们不论官阶等级要立志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官。题目为“忠告”，可见作者的诚意和殷切的期望。

《三事忠告》到底包含了怎样的内容？拿其中的《治官如治家》为例简单介绍一下。

### 治官如治家

治官如治家，古人尝有是训矣。盖一家之事，无缓急巨细，皆所当知；有所不知，则有所不治也。况牧民之长，百责所丛，若序

序，若传置，若仓庾，若囹圄，若沟洫，若桥梁，凡所司者甚众也。相时度力，辨者茸之，污者洁之，堙者疏之，缺者补之，旧所无有者经营之。若曰：彼之不修，何预我事？曷夕代去，自苦奚为？此念一萌，则庶务皆堕矣。前辈谓：公家之务，一毫不尽其心，即为苟禄，获罪于天。

这段文字的含义是：

治国如治家，这是古代人经常说的话。家里的事不管是急是慢都要清楚明了，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那就是管理不力。而且，处理民众之事需要融合各类职责于一身，比如学校、驿站、粮草储备、修建堤坝等。应该观察时机、权衡力量，适时地采取行动。发现破烂的需要立即修复，污秽的立即清理，堵塞的立即疏通，缺失的立即修补，以前不存在的要想办法去建造。若以为是为前任官吏所遗留的问题，有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错误思想，不加以治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别人取代，你又何必如此为难自己呢？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作为官员就再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了。因此，前辈经常会说：“在公事上，稍有疏忽，就是没有功劳还接受报酬，这个人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事忠告》中所蕴含的治理政务的哲学深意在现代仍然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首先，从政者要提高修养，保有浩然之气。张养浩受家族尚儒风气的影响，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始终秉承着廉洁奉公的孔孟之道从仕做人。此外，他还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从政者个人修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在《三事忠告》中，张养浩认为做官之人，要戒贪、爱民、省事、先劳、存恕、自责、礼贤下人，这样才能“确乎有所守，而不夺于势利”。即将要做官的人，要心存仁义礼智，并保有“浩然之气”，这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在

素养。

关于如何保有“浩然正气”，张养浩提出了“反省内求”的观点，即要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牧民忠告》的开篇曾谈到了“省己”：“命下之日，则耐心自省。”

在反省内求的具体行动方面，张养浩认为要做到慎独慎思和博学力行。慎独慎思是反省内求的基本方法，尤其是慎独，不仅用于修身，更是被沿用至为官之道上。从政者保持慎独，可以更加公正严明地处理政务，而如果在慎独的同时，又勤而好学，则会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

其次，从政者要首重自律，工作兢兢业业。

张养浩认为做官要首重自律，他有自己的所奉行的自律标准：“夫所谓严，如处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语，一默，必遵礼法，厥德乃全。跬步有违，则人得而誉之。”他认为凡从政者要始终保持自律、自勉，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此，才能使国家的政治环境与风气保持健康向上的态势，形成良性发展。

此外，张养浩还认为：“己劳则民逸，己逸则民劳，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劳，而使闾阎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乎？”即从政者应有“先君子之心，想百姓之所想，勤政爱民，在政务上兢兢业业，毫不懈怠。此道是为政者精进自我的根本。

再次，从政者要举贤爱民，能够深谋远虑。

在选拔人才的方面，张养浩有自己的方式方法，他说：“询诸人则知之，察其行则知之，观所举则知之。”意思就是，可以先咨询别人，让他们推荐心中合适的人才，然后自己再进行观察，既要观察推荐之人的德行，也要观察举荐之人的品行，最后再对这个人的才能和德行进行综合评价，如果符合采用标准，就可以任用。

在爱民方面，张养浩认为官员既要重视百姓的生活，更要采取利民便民的政策，从而保证百姓的利益。如果每个官员都能严格做到这两点，那么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最后，从政者要团结协作，做到胸襟广阔。

